



风雨“中国梦”

——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

郑丽丽◎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风雨“中国梦”

——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

郑丽丽◎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中国梦”: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郑丽丽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161 - 4739 - 9

I. ①风… II. ①郑…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3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75
插 页 2
字 数 351 千字
定 价 5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14WX004）的结项成果。

本书受唐山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编号：10A01）与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编号：2014CB05）资助。

序

郑丽丽是我招的第一个博士生，她于2006年入学，2009年通过答辩，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唐山师院工作。日前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博士论文已被出版社接受，快要出版了，让我为她将要出版的新著写个序，这让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有些惶恐，因为我一向还自感年轻，突然惊觉到了自己也到了要为学生写序的年龄了，俗谚“长江后浪推前浪”，信然！关于郑丽丽的论著，当年学位答辩委员会的诸位专家已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和褒扬，我就不再谈了，略谈一点由她的这部论著所引发的一些感想。

郑丽丽选择近代文学、文化为她的研究对象，与我近十余年来将研究兴趣转向清末民初这段时期的文学文化现象有关。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始于清末追求自强的洋务运动，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此转型至今仍难说已经完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诸多迷局、困境以及尖锐的、棘手的问题，都往往要促使我们去回顾、思考我们这一百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做过的取舍、获得的收获以及支付的代价。对于此一时期的文学，学界近来从西方学界学来的一种流行的定性是将其称为“民族国家叙事”，这种定义不能说不，但就我的感觉来说，则有点隔靴搔痒。当然相对于传统的王朝国家而言，进入现代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自然会属于民族国家形态，但民族国家建构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中并不足以作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它只是作为一个初级目标和基本要求存在，对文化思想界而言它属于一个“卑之无甚高论”的问题。文学作为时代的最高精神追求的体现者，它所关注的并不止于民族国家问题，而是在此之上的世界大同、文明秩序、进化铁律、时代潮流、历史趋势等终极性问题。所以考察清末至民初的启蒙救亡诉求，我们会发现一个救亡者的所救对象在不断缩减、变化的过程，从自强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的“保国保种保

教”到“国”、“种”、“教”被不断消解重构的过程。清末时期的鲁迅在其《破恶声论》中就已提到两种典型的相互矛盾的救亡主张，即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他说：“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叛）文明。”^① 可为一例。由此可知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立国与立人之间的矛盾，在现代性的初起阶段就已出现，而且在思想文化界引发激烈的论争，并且占据上风的往往并非是与民族国家建构直接相关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不但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后出，而且还因为他们具有更强的现实超越性。所以单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把握近现代文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也许会遮盖近代文化变革中的一些重要的指向。晚清时期的“立国”、“新民”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政治目标，但这对于志存高远、瞩目于“为万世开太平”的近代士人知识层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如针对梁启超的民族国家主义，章太炎当时就大唱反调：“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也。”^② 在他眼中一切国家学说均是：“谬乱无伦之说的炫耀，直与崇信上帝同其混悖。”^③ 他称国家只是一种“虚幻”，只有个人才是“实有”，因此更关心的还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晚清救亡、启蒙思潮的丰富性、多元性和深刻性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它不只是一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还是一个创造一种现代性的新文明、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因此单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以及主权国家的角度等尚不足以概括中国式的现代性的特质，因为中国式的现代不只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而且要成为一个自由、昌盛的文明国家，即使它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出现，它也不同于西方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终极关怀仍具有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藏天下于心”的超越性和包容性，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特性有关。

郑丽丽的论著《“病”与“药”——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首先在史料上下足了工夫，她是一个笃实、稳重、坐得住的人，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学校图书馆的古籍、原刊阅览室里，对清末的新小说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 章太炎：《国家论》，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页。

③ 同上书，第459页。

以及相关的史料进行了充分的收集、整理、阅读，这为她的论文写作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其次，在论述角度和研究方法上也颇有创新之处，如其自述，她是“以文史互证为方法，以‘救国论’为诠释学题域，以‘病’与‘药’为写作线索”来展开其论文的，其目的则是为了“突破习见的意识形态的囿限，在历史复杂性还原的语境中，展开文学—政治的关系性梳理”。通观其论文，我认为作者达到了其所追求的目标。郑丽丽从“病”与“药”的角度来概括清末新小说的主题内涵，我认为是非常准确传神的，对“中国之病”的诊断在近代很大程度上是以强势的西方作为健康标准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也有其虚妄性，如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刊登的小说《虞初今语·人肉楼》中，作者就把西方想象成了中国古代理想的“华胥国”，称其国是“不知所谓君臣，不识所谓治乱”的“世界中自然一极乐国也”。假如西方真像时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则20世纪的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等灾祸也就无从发生了。在当时中国的变革者看来，西方制度是治疗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乱循环”的传统痼疾的灵丹妙药，认为只要将其原样移植，中国就会“合了就再也不会分，治了就再也不会乱”，然而移植的东西假如没有适宜的土壤，就只能作为摆设而已，并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由于救亡的紧迫，近代人在学习西方时难免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对文化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那就是它把功利性原则当成了主导原则，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陷入佛家所言“俗谛”的桎梏，一切超出功利之上的精神价值、神圣价值的消解，直至沦为一种文化虚无主义。从近代的文学文化来看，乌托邦期盼和末世论心态的融合，构成了近代变革的一大动力，其特点表现为他们倾向于从终极的理想状态来看待现在和过去，强化未来与现在和过去的对立和断裂，将现在理解为光明与黑暗最后的决战时刻，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世界即将和必然到来。由此他们也就成为为这必将到来的“光明世界”的开路呐喊者和“黑暗终结者”。这种由非现实的未来和远方支撑的信念，显然带有一种新的宿命论色彩。一旦诗意消退，人们发现未来成谜、“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时，对这种着眼、执著于未来的价值理想的质疑和颠覆就会汹涌而至。因此如何在乌托邦和现实之间探索一条现代中国人的安所、遂生之道，也就成为需要我们“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问题。

总之，郑丽丽此作是一部严肃、认真的用心之作，确能带给人们一些

新的启发和思考，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至于书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则在所难免，尚祈方家批评指正，以利年轻学者的进步和提高。以上所言，多属画蛇添足，而且我本人才疏学浅，并没有真的为人作序的资格，扯些闲篇，聊以塞责而已。

耿传明

2012年12月19日于天津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病”的自觉与“药”的寻觅	
——清末新小说的兴起	(10)
第一节 清末新小说产生的语境	(11)
第二节 “病夫”与“新民”	(24)
第三节 “陆沉”与“醒狮”	(40)
第二章 “病状”铺陈	
——清末新小说中的现实批判	(63)
第一节 清末官场的潜规则	(64)
第二节 “排外”与“媚外”的政治文化解读	(84)
第三节 道德理念的吊诡	(107)
第三章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一):改良与立宪	(127)
第一节 “小说救国”论的勃兴	(128)
第二节 “立宪”进入公共话语	(145)
第三节 改良派小说中的国家主义思想	(161)
第四章 “药”、“剑”、“火”的递进	
——“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二):革命与共和	(179)
第一节 革命派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180)
第二节 革命志士的“烈士情怀”	(201)

第三节 女子舍“身”救国现象	(214)
第五章 病树前头万木春	
——文明排外论域中的“救国”方略	(227)
第一节 “教育救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先导	(229)
第二节 “实业救国”:民族国家富强的基础	(251)
第三节 “理想—科学小说”:民族国家的愿景	(271)
余论	(296)
参考文献	(309)
后记	(324)

导 论

“救国”乃是清末报刊出现的高频词。由此所形成的“救国”论域，成了之后事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问题意识。作为异质于中国历史上传统小说的“清末新小说”，以其富于时代特征的文学性，尚为充分地参与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型的进程。简言之，危局之“病”与解困之“药”，成为“新小说”创作的母题。

清末以前的“中国”，确也经历了诸如朝代更迭和异族入侵等政治危机，比如传统史学所谓“五胡乱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及至清末有“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这一天崩地解的警世之语？这实际上正是对笔者所着力考察的“民族—国家”建构即“转型”的精辟描述。清末国运与时政判断的参照系，乃是西方。“西天取经”的隐喻，在当时落实为向西方学习。“西方”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指涉，而且意义重大地在对举中，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描述为与世界史无涉的“非历史形态”。正如王晓明所指出的那样：

古代中国人大多是秉持一种天圆地方、“中华”居中、四面皆是低等“夷人”的“天下”观念，主要以文化上的优劣差异、而非种族或生理差异来区别“华”、“夷”。……但到晚清时候，情况大变了：首先，中国被迫向“西方”逐渐敞开门户，各种欧洲的器物、观念和人员迅速进入中国……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只是世界上许

^①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冯桂芬分别对时局作出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衡判，其后王韬、严复、梁启超等人也作出了一致的概括。以李鸿章为例，在1872年5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指出“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复又在1875年的《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云，“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5页。

多“国”中的一个，与西欧诸国相比，至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还处于劣势，差不多完全取代了上述那一种古老的“天下”观念。^①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其政治—经济也随之被纳入到条约体制中的“世界体系”。随后为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颓厄发展，其间所反映出的政治上的无能、经济上的困顿和军事上的不堪一击，乃是中国必须以“变”来图存的背景性原因。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深重危机，如何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文明以及未来“中国”的走向，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纪初知识人^②思考的焦点。《天演论》使得进步主义成为一般知识人论说的逻辑预设，自强求富成了国人不证自明的目标。辛亥革命前十年政治思想的萌动，以及制度设计等构想，都直接或曲折地在小说中得以表述，这可以说是清末新小说^③的题旨所在。

传统的“天下”观^④在鸦片战争之后，已经开始引起部分有识之士的反思，但天朝帝国形象的动摇却是在甲午战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⑤一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泱泱大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所败，意味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支配下的洋务自强运动美梦被击碎。朝野内外笼罩着普遍的挫败情绪和民间有识之士变革的呼声，无论被迫还是自觉，在帝国存亡的焦虑与民族受辱的双重挤压下，中国自此启动了现代性的进程。

清末理念层面“天下”观向“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在政治操作的层

① 王晓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② 西方学者称之为“Elite”（精英分子），梁启超曾以多种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之，比如贤人、人才、英雄、豪杰、君子、一二人、士大夫、士君子、秀异者、优秀分子等，名称虽不同，其意义大体相同，皆指一国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本书以知识人名之。只知埋头时文换功名的不算在知识人一类。

③ 本书将“清末新小说”的时间跨度界定在1902—1911年之间。

④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天下’是由‘家’和‘国’构成的，即所谓‘积家成国，积国成天下’。在这里，‘国’是指诸侯统治的地方，‘家’指大夫统治的地方。……按照钱穆的观点，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即是整个世界，即是整个天下，中国人便等于世界中的整个人类。……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来看，‘天下’又有‘中国’与‘四方’之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按照世界主义的‘天下’观，‘中国’与周边部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缘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页。

⑤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面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①的转型，是最引人注目的、极具研究价值的思想史事件。这一“事件”表征出中国不但只是世界格局中的一分子，而且是极其贫弱的一员。清末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现代性）追求的表达，其思想动机的着眼点乃是“救亡”问题意识的累积。

面对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②，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支配下的国人，在现实层面上通过或自上而下^③或自下而上^④的改革，参与到救国大计中来。同时，也有一部分人直接投身教育、实业，以期参与推动历史的进程。于此，救国方略的细化也直接成为“新小说”的重大题材。

正如赵毅衡所说，“当一个文化濒临危机时，文学骚动不安状况往往成为最先表露的部分。”^⑤而此时，传统中国文学中“载道”的诗文，已经不足以涵括这一巨变，于是一向被称为“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小说，迅速被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受国外“政治小说”的启发，二是因为小说“易入人”、“易感人”^⑥，知识人看到了小说对于民众的影响力之巨。已然成为文体升华事实的“新小说”，全方位地负载了救世济民的历史使命，也担当着知识普及与理念启蒙的原创性责任。

本书是笔者在阅读第一手材料即以清末新小说为主要对象时所产生的心灵共振，同时也曲折地表达着自己当下的体验结构所决定的现实关怀。借用《双城记》的开篇：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

① 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化风俗、民主选举，最为根本的是宪政治国——也就是将国家的管理由全民约法的产物宪法来制约。就一般的社会理论而言，具有规范性、稳定性的表述是“民族—国家”。但对中国来说，特殊性在于民族问题即国家问题，更多强调的是救亡、保种，国家对汉语文化是陌生的。在文学中用民族国家，不像社会理论中区别那么大。

② 甲午之后，俄国据东北、德国据胶东半岛、法国据云南为势力范围，列强为维持势力均衡，由英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利益均沾，一方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由政治占领改为经济侵略。

③ 比如变法维新、立宪运动。

④ 比如办报、办刊、结社、演说、演戏、阅报社等方式。

⑤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⑥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①

笔者以为，以此指涉清末乃至今日中国都是适宜的。这正是本书的诠释学基点。

梁启超描述其时为“过渡时代”^②，这种“过渡性”指向着日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基因性构成，同时指涉着本书论域所规定的文学想象的边际。

知识人在新小说中超乎寻常地发挥了创造性以展现其理想，既是对时人民族认同感的激励与确认，以达到“开民智、兴民权、新民德”^③的目的；又是指明走向未来的道路，以达“小说救国”的宗旨。

这一时期，小说地位的提升及小说期刊的繁荣，除却经济与技术的原因，更是中国现代性以自身的文化背景所作出的应激反应。正如王一川所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使伟大而崇高的古典“中国”形象遭受致命打击以来，“现代的中国怎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竞相探索的一个焦点；而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一个神圣使命：以巨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去重新构想“中国形象”。^④

清末新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热潮，使公共想象的空间拓展为东西文化碰撞的基本平台，并引发了横绝千古的文化认同的焦虑与紧张。这一文化焦虑正是清末“新小说”事关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真正动因。清末“新小说”乃是全方位地对世界的想象，是一场汉语文学想象的“思想实验”，它超逸出文学本身而承载着具有现代性意味的“转型”意义。在此，“现

① [英] 狄更斯：《双城记》，张玲、张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梁启超：《过渡时代》，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7页。

③ 严复在《原强》中指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见《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④ 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东方丛刊》1997年第1、2辑。

代性”不仅是一种体验结构，更是进入现代世界格局的国家动员体制的预设。因而，有理由确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性或合法性迄始于清末。

清末“新小说”真正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它提供了时代精神与哲学反思的可能：诸如“天理”与“公理”的辨析，诸如事关“正义”的考量……其中关于国家的想象与民族的自觉，成为中国现代性的策源地。这一声势浩大的文本实验的意义和价值，不在文学。对于与传统中国小说观念大异其趣的清末新小说，规范化的文学研究自是力不胜任的。简言之，以还原论的解读方案形成的诸文本的互文性，聚焦于借文学反映政治的论题。

本书的研究意义还在于，以现代国家行政操作的实际而言（韦伯所谓的“科层制”），发现非专业化的文人政治话语及其实践的缺陷。清末新小说参与了构造宪政意识的历史进程。一如黑格尔—马克思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抨击，自由与尊严成为清末新小说或隐或显的主题或背景。不同于传统士大夫，尽管新型的文人们背弃了“清高”，为个人权利而主张、质疑官府，想象着有别于传统“家天下”的现代国家——但这一切毕竟是朦胧的，甚或是不自觉的。这种缺乏政治哲学自觉的文人情怀，也为日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激进主义埋下了伏笔。

“救国”作为政治口号，是浅表层次的，但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情感与情绪背景。换言之，“是否是一个中国人”，变得极为迫切；相形之下，“是否是一个人”重要，但并不迫切。因而，清末时局的四重对应性关系，即中外、朝野、满汉、古今，其间，中外冲突是枢机，它引发了由朝野而满汉以至于古今的思想格局的成立，其次第乃是一个不断将文化认同问题去蔽澄明的过程。

要言之，在重新调校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清末，新小说以其国家认同以及自我认同的面向，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按照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证，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小说丰富了这种想象的内容，亦即，当小说与民族国家呈现出上述结构性关系，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便借助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呈现了功能性的后果。从此一意义上说，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笔者以为，学界至今依然部分保持着由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的思维定势，即是以当下意识形态化的成说陈论为依据，而透视甚或过滤“历史”，将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现在”作为学术史考察的逻辑预设，并且赋予其先验而不自明的确当性，其论说的逻辑旨在寻求所谓的

“历史必然性”，从而将历史细节粗糙化，甚而将一些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材料弃之不顾，比如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认识”。就此而言，清末新小说研究的启示正在于，“历史决定论”乃是必然性的“迷思”。

笔者的研究姿态就是通过甄别、梳理清末新小说中反映当时社会的几种典型类型，通过新小说的互文性阅读，还原“历史情境”。清末新小说的写作是与清末知识人民族国家的想象相始终的，如果离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就不能理解新小说在清末地位迅速提升，以及在民初的迅速转向。清末新小说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与繁难。

本书以“救国”为切入点，目的也是始终将清末新小说与民族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离弃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将无法理解清末新小说的构建方式。

总之，本书将结合时代状况的全景式史学描述，以理念分型的知识学考察为研究方略，对相关小说进行文本细读，以“救国”论为诠释学平台，进而抽绎出：中国现代性以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所作出的应激反应，“民间”政治与公共空间的初萌，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争，以及清末新政改革刺激下的教育、实业、科学诸种平台的考量。可以说，清末“新小说”真正激动人心之处在于，提供了想象性参与民族—国家构建以及文化反思的可能。而“文学—政治”正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

当然，试图以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兴起等理论视角对清末小说进行重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对于研究对象的学科定位基本上局限于文学史。因而，这种不自觉地将文学性的判识作为研究基准的研究路径，不但对于现代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题域的拓展，有着根本性的毁损，仅就其研究的问题意识而言，对于文化认同的焦虑所引发的政治哲学考量，就被裁割于研究者的视阈之外了。

本书所指涉的“病”，有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国家）两个层面，反映在清末新小说当中，具有逻辑上互为表里的关系，亦即对于个体与国家疗救的“医案”，或为改良—立宪，取法诊治慢性病而采取了渐进一路；或为革命—排满，效法抢救重症急病而着力激进一途。要言之，改良派^①的

^① 对于这一政治派别，学界大体有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改革派几种说法。就历时性而言，改良与立宪具有连续性，笔者以改良—立宪派或以学界最为常用的改良派名之。

戒急用忍，着眼于文化建设之渐进的渗透；革命派之激烈，直如“外科手术”，强调社会变革的一步到位。

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前现代的“中国”的统治方式，呈家国一体的金字塔型结构，其政制的结构与功能相一致，强调对人的管束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本此，本书的着眼点在于，由“朝贡”而“条约”的转折中，新小说创作的帝国心态以及由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分蘖出的“医案”衡判。

鉴于上述，本书的基本思路如述：

首先，以清末新小说的兴起为切入点，梳理其历史语境以及“救国”方案背后的政治理念支撑。新小说的创作，正是清末时政的“应激反应”。以“西方”作为“健康”尺度的“救国”方案，不但具有了现代社会国民动员的政治意味，而且也具有了启蒙主义的身位。身体国家化、“黄祸论”等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印证了“民族主义”在政治层面的运行逻辑。在追慕西方国家主义—现代性与固守“朝贡—帝国”的折冲中，上海提供了公共空间，成为清末新小说策源地的动力学依据。

其次，以小说文本中的“病状”铺陈，还原其社会时代的基本氛围。“谴责小说”之“谴责”，一方面表现为针砭时弊的漫画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懵懂的公共意识的初萌；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引发了由排外而媚外的转向；伦理危机渗透了社会生活乃至家庭的方方面面，假革命、假维新的粉墨登场，再一次使得政治的与伦理的成为考量“病状”的结构性的两极。

再次，以“政治—革命”为分析框架，讨论其时救国方案的理念论争在清末新小说中的具体反映。改良派、革命派的政治理念以及政治实践，均对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因而以改良—立宪派、革命—排满派所创作的小说为对象，展开分析其所包蕴的政治理念。

改良—立宪派以“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的重要作用为依据，开始提出“小说救国”，由此带来新小说的繁荣。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进入公共话语，并成为小说的主题，国家主义思想遂成为改良派小说开明专制论的理念支撑。

与改良—立宪派一意置换政体不同，革命派乃将国体的根本转变作为外科手术般的政治策略。其“小民族主义”的政治用心，是发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内的国民总动员，因而“烈士情怀”、舍“身”救国遂成为革命